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粮价波动与政府应对(1929—1937)

马斗成 刘文玉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消费市场,凭借成熟的粮食流通网络与国内外粮食市场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由于青岛区域粮食供需缺口增大、世界经济危机及帝国主义粮食倾销,青岛出现粮价波动现象。为应对粮价波动现象,青岛市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通过青岛农林事务所推动农业改良增产,通过青岛农工银行促进农村金融流通,推动了青岛农村现代化进程,走出了一条“青岛模式”,但并未有效弥补青岛供需缺口。青岛市政府在监管调节粮食市场的过程中,通过胶海关、青岛市港务局等促进国内粮食运输与流通,减少帝国主义经济干预,通过青岛市商会、青岛市商品检验局等挽救粮食对外贸易的不利局势,在平抑粮价方面取得一定效果,但粮食对外贸易未见实质性起色。

【关键词】青岛;粮价;青岛市政府;乡村建设;胶海关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4-0045-14

Food Price Fluctuation and Government's Respon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MA Dou-cheng LIU Wen-yu

(School of History,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Qingdao was an important grai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market in North China, and it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grain markets by virtue of a mature grain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the 1930s, due to the increasing gap in food production and demand in Qingdao,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imperialist food dumping, Qingdao experienced food price fluctu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fluctuation of food prices, the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promoted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increased production through the Qingdao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Office during the ru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romoted rural financial circulation through the Qingdao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Bank, which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Qingdao's rural areas and stepped out of a "Qingdao Model". But it did not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gap in Qingdao's production and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supervising and regulating the grain market, the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promotes domestic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circulation through Kiaochow Customs and Qingdao Port Authority, reduces imperialist economic intervention, and saves foreign trade in grain through Qingda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Qingdao Commodity Inspection Bureau.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stabilizing food prices, but there has been no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foreign food trade.

【收稿日期】2020-1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自由港研究”(20AZS014)

【作者简介】马斗成(1969—),男,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刘文玉(1996—),女,青岛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

Key words: Qingdao; grain prices; The Qingdao Municipal Government; rural construction; Kiaochow Customs

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问题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其中涉及华北地区粮食研究的论著较为集中,学者多结合农业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对农村经济、粮食运销及粮食价格等方面展开研究^①,为华北地区粮食价格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乡村建设是政府应对农村危机的路径之一,在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指出青岛形成了以城市资源和标准建设乡村的“青岛模式”,肯定了青岛市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及其对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视^②。近代青岛粮食档案资料较为丰富,但此前相关专题研究相对缺乏,档案整理及初步研究成果多见于近代政府统计报告及少量期刊文章中^③。近代青岛曾被德占日据,渗入了大量帝国主义势力与资本,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并列为直辖市,逐步发展成为华北重要粮食集散、消费市场。青岛粮价波动是粮食市场供需失衡的表征,由于青岛特殊的历史缘由和商业地位,政府对其粮价波动的应对主要围绕在农业改良和市场调控两方面,颇具地方特色。本文在挖掘整理近代青岛粮食档案基础上,探索青岛地区的粮食流通网络与粮价关系,挖掘青岛粮价波动缘由,以期进一步拓展青岛地方史粮食研究区域观照,深化近代中国粮食问题研究。

一、近代青岛粮食流通网络

青岛地处山东省沿海,是季风性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共存区^④,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耕地少且土壤硅砂含量高,农业生产条件不算理想,属于缺粮区。受粮食量大体重、不易运输的特性影响,明清时期,“鲁西平原、山东半岛两大经济区的粮食流通各自与相邻省区互为依重,而未能形成一个全省统一的粮食流通中心”^⑤。清代中期以前,青岛多依赖山东半岛供给,也通过海运输入部分粮食,采购市场集中在东北奉天及江南沿岸。开埠以来,在德、日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青岛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消费、集散市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凭借青岛港、胶海关的海路优势及胶济、津浦铁路的陆路优势构建了成熟的粮食流通网络。

1933年,青岛人口总数为444690人^⑥,当地农民种植的麦、薯、豆、花生、小米及高粱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只有90731606斤^⑦,而从外地流入青岛市场的粮食高达177521740斤,由青岛销往外地的粮食达

① 关于粮价波动的研究代表作有:任吉东《近代太原地区的粮价动向与粮食市场——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认为外部省际与内部县际流通渠道使近代太原地区的粮价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相对稳定的局面。任云兰《民国时期华北灾荒与天津粮食市场(1912—1936年)》指出政府调控对天津粮食市场的运行和粮价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张昆亮《山东粮食价格研究(1912—1949)》总结出山东粮食价格水平的变动总趋势,考察了粮价波动的原因及对山东的影响。除此之外,唐致卿《山东粮食经济研究》以山东农户与自然村落为基本考察单位,系统考察了近四百年山东的粮食经济。上述研究多集中在省际或者单体城市。

② 鹿金伟:《政府主导下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东方论坛》2008年第5期;郑国:《“都市化”: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青岛模式》,《东方论坛》2009年第4期;魏本权、柳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王兆刚:《由城入乡: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乡村建设》,《东方论坛》2020年第4期。

③ 青岛市社会局编:《青岛市粮食业调查》,1933年;沈周芬:《青岛之农村》,《棉业特刊》1934年;蒋丙然:《青岛之附近气候与农作关系》,《农学》1940年第3卷第1—2期;周吉士:《青岛市粮食概况》,《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

④ 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⑤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⑥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备忘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0页。详见表2。

⑦ 青岛市社会局编:《农工商统计》,1933年,第8页。

76363181斤^①,可见其粮食流通量。青岛市面上的粮食以麦类、面粉类、豆类、杂粮类、米类为主,各类粮食的来源地与销往地不尽相同^②。分析粮食的来源及销路可知(见表1),胶济铁路联通了青岛与山东其他各县的粮食市场;津浦铁路串连起青岛与皖北、津、沪等地区的粮食市场;青岛港和胶海关则沟通了青岛与苏北、东三省等地区及日、美、澳等国家的粮食市场,故青岛粮食贸易的腹地以山东各县为主,但不局限于山东,也囊括辽东、江南、华南等区域及亚欧美等洲。作为粮食流通市场中的节点,各级流通市场发挥着产地市场、消费市场、聚散市场的功能,并通过各种交通运输线和流通渠道衔接起来,呈现出一张纵横交织、层次分明的粮食流通网络。

表1 青岛粮食的来源与销路		
粮食类别	粮食来源	粮食销路
麦类	日本、山东、江苏等	
面粉类	上海、澳国、美国、日本、青岛等	
豆类	日本、海州、灌云、青口、盐城、济南、崇明、周村、东三省	广州、香港、上海、龙口、汕头、即墨、胶州、青岛及海西各口岸
杂粮类	日本、安东、营口、大连、海州、灌云、盐城、阜宁、济南、东三省、青岛	日本、济南、博山、即墨、胶州、青岛及海西各口岸
米类	上海、芜湖、朝鲜、香港、暹罗、东三省、海州、盐城、灌云、阜宁等	济南、胶州、平度、即墨、莱阳、周村、青岛市内外等

资料来源:青岛市社会局编:《青岛市粮食业调查》,1933年,第2页。

说明:空白处数据缺失。

在青岛的粮食流通网络中,农民、批发商和零售商是粮食流通的主体,粮食贸易商店和交易所是粮食流通的主要媒介,推动粮食生产、加工、贮存、销售各环节协调运行。麦类、豆类等粮食商品化程度高,经加工制成的面粉、草帽辫、花生油、豆饼等商品由青岛外销世界各国。在出口贸易刺激下,青岛的面粉厂、油厂、饲料厂蓬勃发展,粮食加工业逐渐成为农村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促进了青岛粮食市场的流通和粮食商品经济的发展。华商主要经营土产行、代理店、批发店及零售店四种,土产行商以售卖花生米、花生油等土产为主,附带售卖米、麦、杂粮;代理店商根据买家需求推销代理粮食买卖业务;批发店商“多在各粮食之生产地或通商大口岸设有庄店坐地收买,至相当时期即将所收买之大宗货物完全运入本市,再推销各小商家及鲁东鲁西各大口岸”^③。1934年青岛有堆栈64处,占山东省大半,其中经营粮食土产的25家^④,青岛成熟的土产堆栈行业大大提高了山东粮食市场的运行效率。青岛取引所^⑤和青岛交易所^⑥的成立推动了青岛市场交易形式向现代化的嬗变,增强了青岛与各级粮食市场的联结程度。

青岛粮价与粮食流通网络密切相关,与粮食的产量、运输成本和经销商利润分配等挂钩。由于粮食品质、流通成本、流通渠道、交易方式不同,各级市场的粮食流入青岛后,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1932年,青岛市场上有23种不同品牌的面粉,产地为上海、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青岛,其中澳大利亚

① 青岛市社会局编:《青岛市社会局业务特刊》第五编《公益行政》,1934年,第8—14页。

② 麦类、豆类等粮食商品化程度高,经青岛加工制成的面粉、草帽辫、花生油、豆饼等商品远销世界各国。

③ 青岛市社会局编:《青岛市粮食业调查》,1933年,第1页。

④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粮食志》,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⑤ 1920年,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建立青岛取引所,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人控制。

⑥ 1933年,青岛市政府建立青岛交易所,与青岛取引所抗衡。青岛交易所设有土产部和纱布部,办理花生米、花生油、豆油等粮食及纱布等土产的期货交易、现货交易及土产堆储等业务。

产的“天王牌”面粉品质好且运输成本高,是市面上最贵的面粉品牌,每袋达到6.26元,而上海所产的“红财神牌”面粉最便宜,每袋仅2.12元^①。青岛的粮价对各级流通市场也有直接影响,“青岛交易所的商品成交行情动态,影响国内外的土产、纱布市场”^②,粮商、买办、洋行等充当着各类粮食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中介,他们对地区间的价格差颇为敏感,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粮食供给失衡与减轻地区间过大粮价差异的作用。在通畅的粮食流通网络下,粮食产品品类与价格的多样化可促进市场的自发竞争,而成熟的市场竞争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又可促进粮食网络的高效流通和粮价的动态稳定。

二、供需失衡下青岛的粮价波动及缘由

粮价变化是自然、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反映民众购买力的强弱、农商业经济的兴衰及社会状态的稳定程度。市场供需平衡时,粮食流通网络顺畅,粮食价格保持稳定,否则便上下波动。一般来说,粮价出现短期的季节性波动十分正常,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虽然政权和社会状态都较前稳定,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青岛粮价波动却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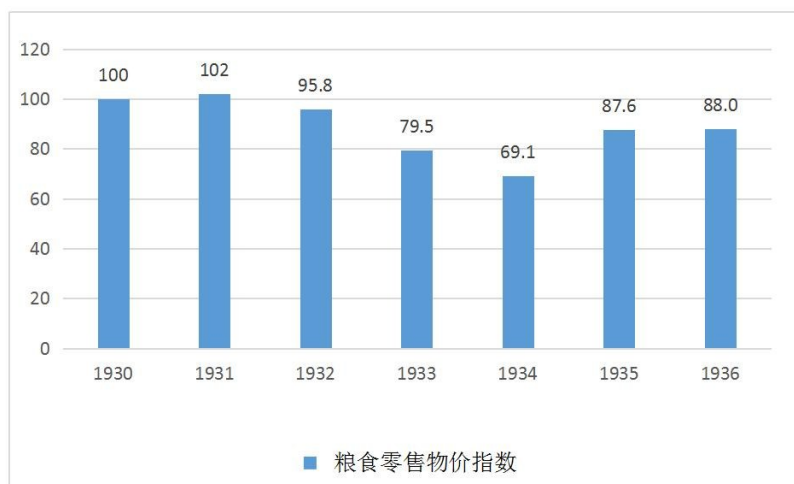


图1 1930—1936年青岛粮食零售物价指数(简单几何平均)

资料来源:《青岛零售物价指数(简单几何平均)》,《物价统计月刊》1936年第2期。

说明:1930年青岛粮食零售物价为基数,记作100。

零售价是粮食经农户、批发商和零售商之手流入市场后,民众日常买到的常规价格,粮食零售物价指数体现出一定时期内粮食零售价格的变动趋势和变化程度。以1930年青岛的粮食零售物价为基数,记作100,观察1930—1936年青岛的粮食零售物价指数(见图1),可以发现,1930—1934年青岛粮食零售物价指数急剧下跌,1934年粮食零售物价跌落谷底,仅为1930年的69.1%。1935年和1936年的粮食零售物价逐步回升,但是依然低于1930年。1930—1936年青岛花生米及黄豆的具体价格走势(见图2)与青岛粮食零售物价指数变化基本吻合。花生米的价格一度由1930年的16元/百斤跌至1934年的5元/百斤,总的说来,在20世纪30年代,青岛粮价经历了大幅度下跌,1934年粮价跌至最低,随后缓慢回升。

天津与青岛是华北对外贸易最繁荣的城市,两大商埠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被动开展对外贸易,将华北粮食贸易纳入世界市场。“在华北天津和青岛可归为高级市场,它们做(作)为交通枢纽,沟通了世界市场、沿海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商品联系,有较强的吸辐(附)和集聚能力,在自上而下形成的华北近代

^①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粮食志》,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② 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内部刊行,第59页。

化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①。青岛以花生、豆饼、蛋品、草帽辫、烟草、煤炭、盐等产品为出口大宗,天津以棉花、皮毛、蛋品、草帽辫、地毯、煤炭、盐等产品为出口大宗,两口岸在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上有相似之处的同时各具地方特色,形成竞争且互补的关系^②。那么在青岛粮价跌落的同时,天津粮价是否出现相似情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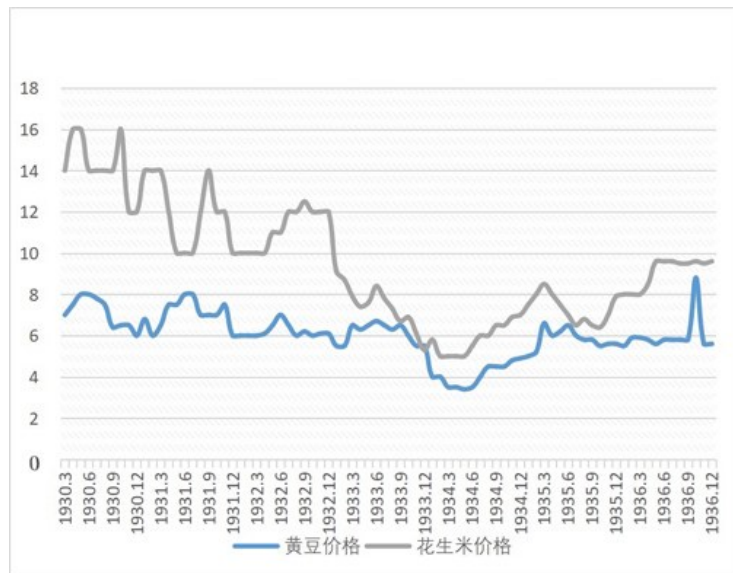


图2 1930—1936年青岛花生米、黄豆零售价格 (单位:元/百斤)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摘自青岛市商品检验局刊印的《检验月刊》与《检验季刊》中的“青岛市零售价格表”,花生米及黄豆的价格数据精确到月份。

从同一时期天津的农产品批发物价及粮食价格的涨跌走势看(见图3),1924—1937年天津农产品价格经历了先跌后涨的起伏,至1936年才恢复到1926年的水平,其中1933年和1934年天津农产品价格以极低水平运行,可见20世纪30年代天津农产品价格与青岛粮价的波动情况有较强相似性。以草帽辫^③为例,青津凭借卓越的经济、地理优势成为国内瞩目的草帽辫出口口岸,但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和意大利人造丝、日本纸捻辫的竞争下,中国草帽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式微,此时国内市场美麦泛滥,麦秆积压,草帽辫在国内市场上的贸易也一落千丈,青津草帽辫面临着出口滞塞、价格下跌的困境。青津两地的粮价波动是华北粮价波动的缩影,是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动荡的体现,体现出粮食出口贸易的被动性。虽然两地粮价波动呈现相似之处,但波动缘由并不完全相同,必须结合地方特色具体探讨。两地不仅在对外商品贸易结构上存在差异,粮食贸易的主要腹地也不同。与天津相比,青岛与上海、广州等华南地区的粮食贸易往来更加频繁,青岛在沟通华南、华北粮食市场的作用更显著。在青岛市经营花生业务的94家土产商中,有48家与上海、海州、香港、广州等华南区域有业务往来,有15家与日英德等国有国际业务往来,其他的土产商主要经营山东地区的业务^④。青岛与沪、津密切的经济交流使其粮食贸易区域由山东地区拓展至华南、华北,对沟通华南华北粮食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分析结合青岛的自然、社会、经济背景,深层次探究青岛粮价变动之缘起,重现青岛农商经济面貌。

① 张利民:《论近代华北商品市场的演变与市场体系的形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详参张利民:《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75—85页。

③ 草帽辫是由麦秆或其他谷物杆子编制而成的中国土产,实现了谷秆等农产品的再利用,一度成为华北农民重要收入来源。

④ 《青岛市花生类土产商一览表》,青岛市档案馆,B47全宗1目录第965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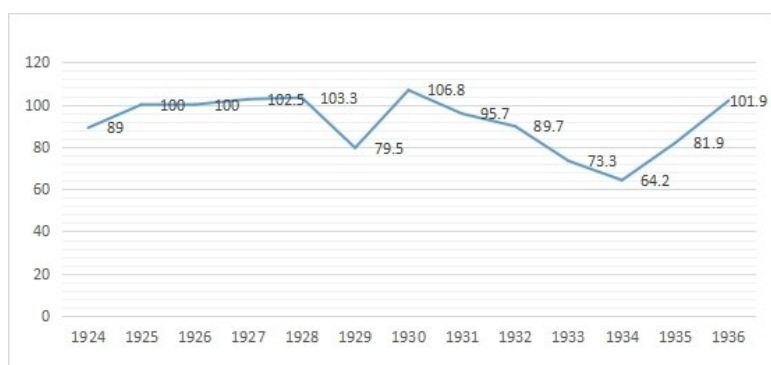


图3 1925—1937年天津农产品批发物价年指数(简单几何平均)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第12页。

说明:1926年天津农产品批发物价年指数为基数,记作100。

(一)青岛区域粮食产需缺口日益增大

青岛农村粮食产量不稳定,不利于粮价的长期稳定。粮食丰歉对粮食产量及价格的影响是直接且显著的。1933年和1934年是青岛地区的粮食丰收年,史载“1933年,青岛市近郊农业丰收,粮价暴跌,芝麻、高粱、黄豆的出口价格跌至4~5成。是年8月,每担花生仁降到7.00元,12月份继续降至4.85元”^①。与此同时,大量美麦通过中美棉麦借款输入青岛,加重了青岛的粮食供求失衡,粮价再度暴跌。旱涝蝗灾也是政府难以预防的不可控自然因素,1935年胶东苦旱,30多县受灾,麦苗全部枯竭,地瓜和小米无法播种,民食堪虞,粮价遂上涨起来。

在青岛农村产量有限且不稳定的情况下,增长过快的人口拉动了粮食消费内需,导致青岛区域粮食产需缺口越来越大。由青岛市人口增长情况(见表2)可知,1929年青岛总人口共计362151人,1936年竟达到570037人,人口总数翻了1.5倍多。此时期青岛人口的急剧增长来源于非农业男性人口的增长,从数据可知,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基数与增速远超农业人口,且男性数量遥遥领先于女性,这是因为近代青岛经济功能强劲且为移民城市,多吸引日俄外商、清朝遗老及劳工等民众定居,外来人口以经商或者打工为目的,以男性为多,拖家带口者占一小部分。因此,自然、社会因素制约下,区域粮食产需缺口的日益增大是造成粮价波动的缘由之一。

表2 1929—1937年青岛市户数、人口数 (单位:人)

年别	户数	总人口	按性别分		按农业非农业分	
			男	女	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
1929年	69742	362151	224200	137951	262173	116218
1930年	74281	379082	233864	145218	259408	119674
1931年	75632	402752	246760	155992	281174	121578
1932年	81845	426417	259889	166528		
1933年	87290	444690	270446	174244	356512	92853
1934年	90056	452379	274114	178265	354726	97653
1935年	105332	527150	312537	214613	301192	102823
1936年	110795	570037	331669	238368	339427	107475
1937年	76765	381364	215392	165972	270369	110995

资料来源: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备忘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说明:空白处数据缺失。

^①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粮食志》,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二)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民众购买力

由于银价下跌,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直到1932年才显露出来,随后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加速了中国银根紧缩。通过研究中国几个大城市趸售物价,可以探知当时中国大体的物价涨落情形。“趸售物价即批发物价,趸售物价指数可籍以明物价升降之程率,量物价之盈虚,并可考验商情循环,盖(盖)物价循环常与商情循环同时并进也”^①。《上海物价月报》统计绘制了1932—1937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趸售物价指数图以探究全国物价变化情况(见图4)。青岛、天津、汉口、上海、南京、广州、长沙等7大城市的趸售物价指数从1932年开始急剧下跌,1934年和1935年低价运行,抗战爆发前夕,物价指数又急速上涨。物价的整体跌落为粮价的跌落奠定了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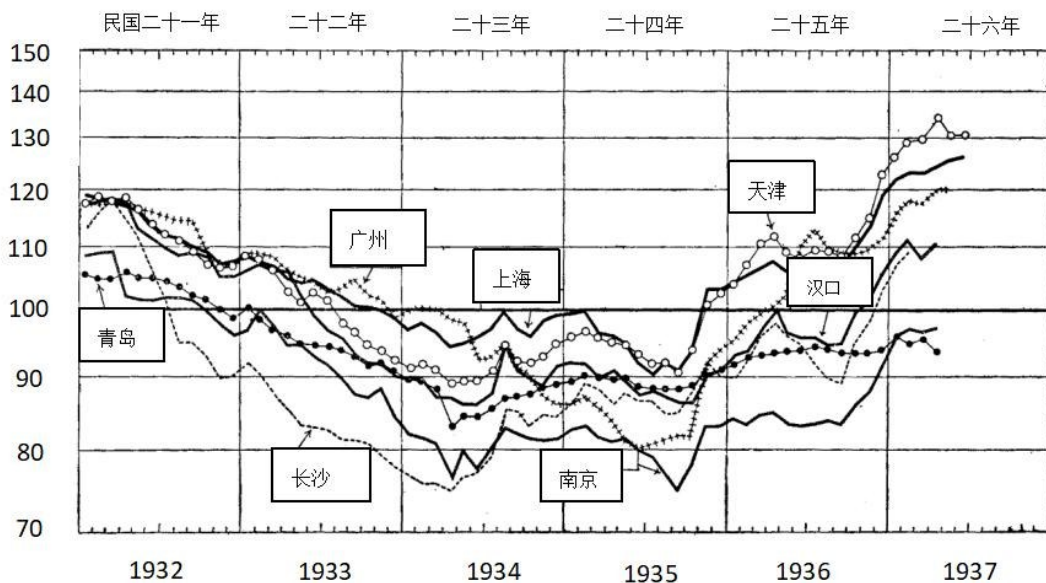


图4 1932—1937年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青岛长沙趸售物价指数图

资料来源:《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青岛长沙趸售物价指数图》,《上海物价月报》1937年第13卷第5期。

说明:青岛、汉口、南京以1930年趸售物价为基数,记作100。长沙以1931年6月趸售物价为基数,记作100。

世界经济危机下,全球粮食供给总体过剩,世界粮价以低位运行。青岛面临严峻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贸易危机的挑战,经济滞涨呈现加剧态势,尤其体现在土货对外贸易的衰退上。1932年,“青岛直接出口土货,则由上年之4800万两,跌至2590万两。运往通商口岸者,亦由5790万两减至4500万两矣”^②。青岛是全国花生的终极市场,花生仁、花生油、豆饼等土货受到世界市场冲击,导致“花生米积存五万吨,花生油积存两万吨”的囤积情形,而将花生运往广州又面临高昂的运费及杂税,“生油每百斤征洋一元五角,生米每百斤征洋五角”^③。土货出口转内销之路阻碍重重,商人无力承担巨额捐税,被迫低价售卖花生及制品,1934年青岛农产品贩卖业新开设店铺21家,倒闭35家^④。农户无力支付赋税及农村贷款,被迫低价售粮,购买力进一步降低。时人认为,“农产输出增减的原因,主要的是国内的剩余供给与国外的不足需要的双重作用关系”^⑤。青岛粮食价格跌落从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对青岛工农商业的巨大冲击和消极影响。

① 实业部编:《中外物价指数汇编》,1932年,第3页。

② 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86页。

③ 《青岛土产衰落》,《工商半月刊》1934年第6卷第5期。

④ 青岛市社会局编:《青岛市社会局行政统计》,1934年,第7-8页。

⑤ 张培刚:《中国农业经济的新动向》,《农村周刊》1935年第162期。

(三)帝国主义对华实行倾销政策,挑起粮食走私

20世纪30年代,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对华倾销政策,国内米麦面粉入超严重。日本在华北实行“扩张商权”活动,极力扩张商业资本,“迄1936年底,青岛日商增至1094家,营业种类达127种,经营土特产品和日货贸易商户数的增长,是这一时期日本商业资本扩展的重要表征”^①。日商侵占面粉市场,对青岛的民族面粉业造成了严重打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青岛面粉业失去了东三省的营口、安东等处的大市场,日商能免税向东三省输入面粉,而华商输入面粉须征税二角,粮食运销过程中产生的码头捐、铁路捐等苛捐杂税及运输费用高昂,令华商难以承担,国货根本无力竞争,“在前每年国粉销于东省^②,约有四百万包,自为日货倾销后,上年据各厂调查,只二三万包”^③“各面厂受洋面倾销影响,相率减工,以致用麦减少,胶济线各地产麦因之滞销”^④。青岛中山路及聊城路等商业街充斥着廉价日式面粉,与国货滞销形成鲜明对比。青岛是遭受帝国主义倾销政策严重影响的城市之一,呈现了中国粮食市场被帝国主义恶意侵犯的历史。

由于特殊的殖民历史和重要的商业地位,青岛成为帝国主义以走私、投机等手段扰乱粮食市场的前沿阵地。最初,青岛走私货物集中在人造丝和砂糖等高税易运的物品,随着走私势力的扩大,华北发展成无货不私运的日货天堂,“全部走私品的80%是输入华北地区的,而山东占了64%”^⑤。1936年胶海关的洋米进口量减少了48647公担^⑥。走私不仅侵犯我国关税主权,还压低我国国货价格,影响粮食市场与民族粮食加工业。“自走私以来,前后五六个月中,国内面粉厂,极度紧缩,私货充斥,到处皆有,现各厂均在减车停工,若再延长时日,各厂势必被迫停业”^⑦。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倾销政策和走私政策,侵占中国粮食市场,不仅导致青岛粮价低落,还打击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三、农业改良与市场调控:青岛市政府应对路径

粮价跌落往往与农村地价低落、土地抛荒、村民离村及金融流通阻塞等环节相扣,形成农村经济持续衰弱的恶性循环。南京国民政府收回青岛后将其设为直辖市,对粮价波动及经济发展比较重视,青岛市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厉行农业改良政策,旨在提高粮食产量,填补青岛区域粮食供需缺口,在市场调控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维护市场秩序,平稳粮价。

(一)厉行农业改良政策

德国占领青岛之初便以增强殖民统治为目的,对青岛实行城乡分治、华洋分治的管理方法。当局重新划分城乡行政区划,将青岛的城区打造成“东方瑞士”,但未重视乡村发展,致使乡村发展迟滞,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20世纪30年代,青岛粮价大跌对农村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此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浪潮,在此契机下,青岛市政府结合市情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运用城市资源发展乡村建设并形成了“青岛模式”^⑧,青岛市长沈鸿烈“发起青岛乡区建设的目的从属于更大的政治范畴即地方自

① 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08页。

② 东省即东三省。

③ 《面粉业之危机》,《青岛工商季刊》1934年第2卷第2号。

④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77页。

⑤ [韩]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1933—1937)》,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17页。

⑥ 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97页。

⑦ 《面粉业之危机》,《青岛工商季刊》1934年第2卷第2号。

⑧ “青岛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借助城市的组织、人员、资金等优势建设乡村,这与政府主导下的其他乡村建设不同,也与知识分子主导、立足乡村本位的乡村建设不同(如“邹平模式”)。

治与挽救港口商业,尤其是拯救与发展都市经济,基于对青岛乡村与城市的差距、青岛与世界的联系、工商业之于青岛之重要性的全方位把握”^①。基于此,青岛市政府在乡村成立乡区建设办事处,派市政府职员分驻各办事处,在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建设乡村,其中对农村经济复兴的建设主要体现在推动农业改良和促进农村金融流通上。

1. 促进农业改良,推广农业技术

青岛农民粮食种植技术较为传统,使用的种子、化肥、农具等农资比较落后,所生产粮食的质量与产额不算理想。针对这种情况,青岛市政府大力扶持本地农业并投入资金、人才,向农民普及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旨在提高农民种植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据统计,青岛市农田园圃每年所需资本中,“肥料占61.44%,农具占24.91%,种子占7.66%,劳力占5.99%”^②。可见肥料和农具占据农民生产资本的大半。青岛农村的耕地缺乏地下水和有机质,农民施肥技术也很落后。为此,青岛市政府以改善青岛耕地条件为目的进口了大量化肥,“1925年青岛硫酸铵进口只有945担,而到1930年进口增至56094担”^③。受资金与农业机器限制,青岛商人多在小磨坊加工生产面粉、豆油等农产品,不利于民族工业的规模化经营,而日商凭借强大的资金优势与先进设备,在青岛粮食加工行业早已占据一席之地,“日商三井经贩花生米油及煤,其代价年可二千万。是粤商八家不足当彼之一家也”^④。为此,青岛市政府下令酌量减免农具营业税,推广引进了榨油机、磨粉机、切面机、脱粒机、拖拉机等新式农副产品加工机器,扶持民族工业。据胶海关统计,“从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青岛海关输入农业机械价值47835.29银元”^⑤。到1930末期,粮、棉、油等加工机械已成为青岛民营铁工业中机器制造行业的重要产品。为挑选合适的粮种,农林事务所开设了李村农事试验场,对小麦、甘薯、马铃薯、落花生等粮食作物做了各种调查、试验及推广。“是以改良农作物,提倡农家副业为乡区建设复兴农村之根本要因”。以小麦为例,青岛地区的红、白小麦质量及产额偏低,青岛农林事务所针对小麦开展了品种观察、质量检测 and 病虫害抵抗力等试验,并引进国内外优良麦种以推进改良事业。据统计,1933至1936年间,青岛市农林事务所发放的优良作物种子达到28990市斤(以小麦为主),特约农田^⑥的面积达到1376.26亩^⑦。农林事务所还与青岛市农会合作,共同商讨组织农事的实验与推广事项,包括作物、园艺、畜牧的试验与改良、动植物病虫害的研究与防除、公园的设计改进与管理等事项。

2. 救济灾区农民,促进农村金融流通

20世纪30年代,全国旱涝灾害频繁,大量地主富商趁机盘剥兼并土地,灾民无地可耕。对此,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灾区农田出卖救济法》,规定“灾区内农田之买卖准出卖人于五年内以原价买回,在五年之内,买主如将田地出卖时,原出卖人之租赁权及买回权仍不得变更”^⑧。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权益。1935年,青岛渔区春汛不佳,夏季亢旱,农民农产与渔业收入欠佳,难以缴纳赋税,维持生计。“竹岔岛四面环海,计居民七十四户三百七十六口,仅有地一百三十余亩,其地质概系沙碛,以地瓜为

① 魏本权、柳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② 青岛社会局编:《农工商统计》,1933年,第9页。

③ 陈新岗、张秀雯:《山东经济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

④ 袁荣变编纂:《胶澳志》卷5,青岛出版社影印版,2011年,第76页。

⑤ 唐致卿:《山东粮食经济研究(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4页。

⑥ 青岛市农林事务所于各乡村设置特约农田,择定优秀农户为特约农田户,在保证特约农田户获得相当利益的条件之下,专派农业指导员加以监督指导。在青岛市农林事务所指导下,特约农田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种田,用来栽培特种作物,以供推广之用。另一种是试验田,用来改良农作技术。

⑦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备忘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75—76页。

⑧ 《府令:训令:青岛市政府训令:第一七〇三号(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三日):令社会局、财政局、各乡村建设办事处等:为准内政部咨达救济灾区农田出卖法令仰知照由》,《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4年第44期。

唯一产物,本年亢旱情形实较薛家岛等为尤甚,地瓜收成尚不及往年十分之二”^①。为此,青岛市政府作出了减免薛家岛等二十五村田赋的决定,将竹岔岛被旱成灾九分以上地亩的十分之八田赋豁免。除此之外,青岛市政府整顿仓储,设置了农仓和积谷仓,提高了救灾备荒能力。

青岛市政府设立青岛农工银行,促进农村金融流通。农村高利贷是近代农民借款的主要途径,是地主富农借机盘剥压榨农民的方式,在农村经济衰弱之时,高利贷对农民压榨更加严重。青岛农工银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村高利贷的垄断地位,能够帮助农民获取农业生产费用,缓解生活困难。青岛农民从青岛农工银行贷款有多种便利,不仅手续更为精简,利率也更低。青岛农工银行还在李村、薛家岛、夏庄、阴岛等地广泛开设办事处,经营农贷业务,“1936年放出款项总额117269元,收回15671元,年末余额为83.473元”^②“查本处辖境93村,12500余户,自附设农工银行以来,调剂金融,村民利赖实惠,所及口碑载道”^③——体现了农民对青岛农工银行的依赖与认可。凡此措施促进了农村金融流动。

(二)增强粮食市场调控

粮价波动会加剧区域间粮食供求不平衡,滋生中间商投机等行为,是粮食流通网络不畅、粮食市场运行不稳定的表征之一。为了将粮价与市场恢复至稳定状态,青岛市政府从宏观角度调节市场,通过修改粮食运销税则促进粮食流通,通过增强市场秩序监管改变粮食对外贸易的不利局势。

1. 修改粮食运销税则,降低国内粮食流通成本

青岛粮食运输必经之关为胶海关、港务局或胶济铁路管理局,粮食进出口税、粮食转口税、装卸搬运费、码头费及堆栈租赁费等费用就成为粮食运输的主要流通成本。为了限制洋米洋麦输入,促进国产米粮出口,政府从降低粮食流通成本角度出发,对胶海关、港务局及胶济铁路管理局作出指示。

胶海关曾长期被德日操控,粮食进口免税及土产出口征税的政策为外粮泛滥创造了条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重订米麦面粉进口税率的决议,胶海关相应加征外国粮食的进口税,以舶来面粉为例,“凡舶来面粉按照统税率每包征收国币一角,其重量应以49磅为标准,原包不及49磅者亦作一包,征税如有超过49磅者,按照比例申算”^④。胶海关还减轻花生、大豆等土产的出口税,“政府鉴于花生贸易之可危,乃自六月二十五日起,将花生仁出口税率,每担减为国币三角,花生油则减为四角七分,以资救济”^⑤。青岛市港务局将花生米、花生油的码头费减收三成,并自1934年2月9日起实行了三个月^⑥。胶济铁路将花生米、大豆、米麦等粮食的铁路捐税减至五成,并延期多次。

上述措施以救济青岛土产出口、降低运输捐税为重点,减轻了国内外粮泛滥的现象,利于调剂粮价。尽管青岛市政府酌情减免了青岛粮食的运输成本,但是对于全国范围的转口税却无能为力。转口税是增加粮食流通成本的重要一环,青岛商人曾多次请求减免,但青岛市政府却无法照准,答复道“年来商业衰弱,殆为各埠共有之象,如对青岛运销他埠之土货免予征税,则各埠商人将要求同等待遇,牵动原定税则,足以影响国家收入”^⑦。这是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关卡林立导致全国粮食统制政策无法完全统一的后果。

①《府令:指令:青岛市政府指令:第一二三九六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令财政局:呈一件为竹岔岛因灾呈请豁免田赋请鉴核由》,《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6年第77期。

②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编:《青岛市农村金融志(1897—1988)》,1990年,第139—140页。

③《府令:指令:青岛市政府指令:第八四七号(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令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呈一件为呈请令飭农工银行增加农民贷额由》,《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4年第54期。

④《胶海关税务司就面粉及别种货物征税统税事的布告》,青岛市档案馆,B47全宗1目录第965卷。

⑤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90页。

⑥《府令:指令:青岛市政府指令:第一六〇二号(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令港务局:呈一件呈报实行减收花生米花生油码头费三成日期祈备案由》,《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4年第55期。

⑦《公牒:电报:青岛市政府电(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七日):电广东省政府:据驻青广帮慎安堂代表张露枝呈称农产专税局征收花生米花生油税与定章抵触电请迅赐取消以示体恤由》,《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4年第56期。

2. 取缔奸商私运及不正当粮食消耗,提高商品检验品质

胶海关加强查缉职能,打击华北走私。针对日韩浪人及奸商等不法行为,胶海关、青岛市社会局及青岛市商会合作,严厉取缔山东沿岸的私运现象,“若对转口运销国内之粮食并加禁止,则流通阻滞似非中央通筹全国民食之意,至运销国外乃奸商营私渔利之行为,自应绝对禁止以杜漏”^①。山东北岸走私以1933年为最盛,自1934年胶海关按照《海关缉私条例》严格查缉后,日韩浪人的走私活动稍为敛迹,1935年私运进口货价值遂由2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左右,走私量减少到1933年的一半^②。胶海关缉私取得成效,走私重心也逐渐转移至河北沿岸。

政府严查奸商非法活动,取缔不正当粮食消耗。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青岛之初,在社会局下设粮食管理处,加强了粮食管理处对粮商粮贩的管理工作及粮食进口的检查工作,着手改变青岛粮食业自我管理的行业运行模式。日商在青岛势力强大,通过操控青岛取引所加以掠夺、垄断了青岛的粮食市场,引发商民不满。青岛市政府联合青岛市商会抵制日商,不但取缔了青岛取引所买空卖空的现象,而且建立一个完全由华商经营的土产贸易中心——青岛交易所,青岛市政府通过该机构调控粮价,建设市场良好秩序,“青岛交易所的商品成交行情动态,影响国内外的土产、纱布市场”^③。青岛市政府还加大了对奸商的惩处力度,1931年各省旱涝大灾荒期间,粮食奇缺,南京国民政府购买美麦756万担“以惠灾黎”的同时,部分商人却囤积居奇,借以牟利,有私运粮食出口者,有消耗大小麦、高粱及绿豆等粮食酿酒者,“每年消耗之量以全国计之,至少亦在五千万石以上,倘能明令停酿,以此免耗之五千万石移为灾民顾命之需,以每人半年食用二百七十斤计算,计可全活灾民一千八百余万”^④。为此,青岛市政府下令停止酿酒来节省粮食不正当消耗。青岛市政府的严格管理推动了青岛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增强了青岛在华北粮食网络中的良性集散功能。

青岛商品检验局提高进出口商品品质,提高中国国际贸易信用。部分中国商人昧于小利,将优劣混杂的粮食商品销往国际市场,此种行为拉低了粮食整体品质,严重毁坏了中国商人声誉,也是近代中国土货在出口贸易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之一。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春,在青岛、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设立了商品检验局。青岛商品检验局以增进输出商品质量价值为宗旨,对青岛的生丝、棉麻、茶叶、米麦及杂粮、油、豆、牲畜毛革及附属品等其他贸易商品出口时进行严格的品质检验。青岛豆类、油类商品被列为青岛第一批检验的粮食作物,胶海关要求商人必须出具检验证书才可报关出口^⑤。检验报告显示,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花生仁、花生油、花生饼等商品在外销商品中检测数量最多,品质也得到提升,利于青岛国际贸易的发展^⑥。

四、行而不力:青岛市政府应对的成效与局限

在青岛市政府的农业改良与市场调控下,青岛粮价从1934年的低谷缓慢回升至相对正常状态,粮

①《胶海关监督公署就行政院呈报民食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事给胶海关税务司的公函》,青岛市档案馆,B47全宗1目录第819卷。

②[韩]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1933—1937)》,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218页。

③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内部刊行,第59页。

④《府令:训令:青岛市政府训令:第八一一二号(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令社会局、公安局:为奉行政院令禁止糟坊酿酒免耗食粮等因除布告并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局遵照办理由》,《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1年第27期。

⑤《胶海关监督公署就转讯青岛商品检验局豆类、油类两项商品开验日期事给胶海关税务司的公函》,青岛市档案馆,B47全宗1目录第811卷。

⑥青岛商品检验局推出了《检验月刊》、《检验季刊》、《山东之落花生》等杂志与统计报告,聚焦青岛商品检验与技术改良,收录大量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报告,对粮食价格、国内外市场及供销情形也关注较多。

食零售物价指数由1934年的69.1涨到1935年的87.6,再涨到1936年的88(见图1),可见青岛市政府对粮价的调节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内粮食贸易形势总体一度向好。由于青岛本地供应的粮食在市场所占比例较小,所以相比农业改良,市场调控对于青岛粮价的调剂见效更快。青岛市政府在应对粮价波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体现出部分政策的局限性。

(一) 农业改良取得成效,亦呈现脆弱一面

青岛市政府采取的农业改良政策促进了青岛农业技术进步,使青岛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发生现代化的嬗变。青岛农林事务所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农民栽种技术提高和粮食增产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李村农事试验场改变了青岛传统农业发展自发无意识的旧格局,开启了青岛与世界先进的农业科技接轨与交流的进程”^①。青岛农工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青岛开设农业银行之始,是青岛农村金融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措施无不体现“青岛模式”对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也为部分地区乡村建设起到了模范作用。

虽然青岛市政府在农业改良方面做出尝试,但并未在农业增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青岛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着覆盖面小和见效慢的问题,短期之内无法达到粮食增产目标。尽管青岛市政府引进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但并未在农村全面推广,大多数农民依然分不到优良作物种子、化肥与农具。另外,粮食产量受自然因素影响最大,青岛市政府推动的农业试验和推广的周期较长、见效较慢,无法在短期内弥补旱涝灾害带来的粮食减产问题。再者,由于农民的所有权缺乏保障,青岛农民对政府农业改良兴趣不大。此弊端要追溯至德占时期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殖民当局在占领青岛之初曾丈量农村土地,按照面积分派地租。彼时农民自行摊认汇缴地租,私下进行土地买卖,没有做土地登记与所有权的变更程序,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积弊丛生,“无地缴租,有地免税”的现象越发严重,即“往年地主甲将土地卖于乙,当时为欲得到较多之低价,乃于卖契书明:嗣后一切依地亩所缴纳之粮税等统由原主甲负担,业主乙从此不负任何负担”^②。可见青岛市政府在农业推广上的努力远远不够,只有注重农民土地权,落实土地登记、清丈等政策才能带动农民积极性,实现农业稳定增产,填补青岛区域粮食产需缺口,进而稳固粮价。

(二) 未能切实体恤下情,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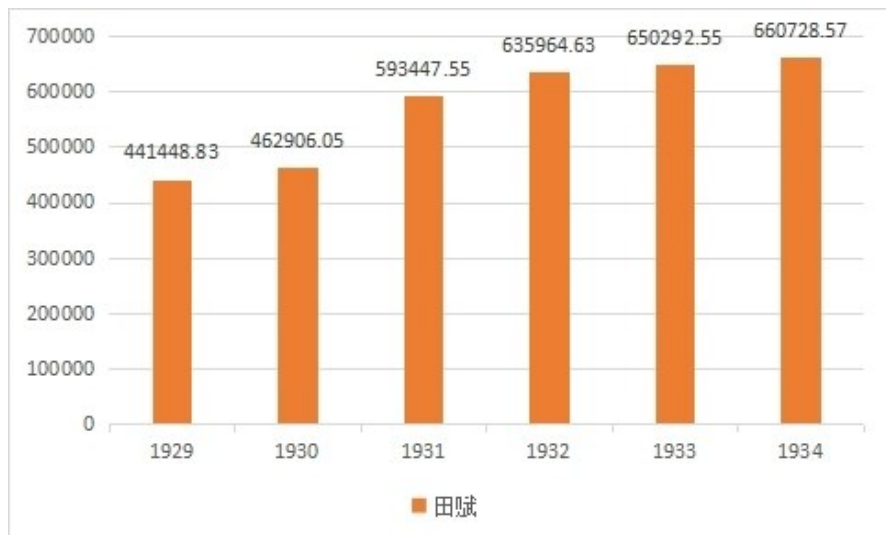


图5 1929—1934年青岛市田赋收入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备忘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① 樊晶晶:《从李村农事试验场看近代青岛对外国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推广》,《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② 沈周荪:《青岛之农村》,《棉业特刊》1934年特刊。

虽然青岛市政府减轻了灾区的田赋,但青岛农民整体上依然承担沉重赋税。青岛农民的直接负担包括田赋、村中用费与地方建设费等,然而仅日益增长的田赋就已压得青岛农民喘不过气来。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实行赋元制,对农民征收正赋和附加税。“田赋正赋每亩征银元4元,其中2.2元为国税、1.8元为地方财政收入,田赋附加为正税的2.6~2.7倍”^①。这项赋税对农民来说已经很沉重了,1928年田赋划归地方后,各地巧设名目,征收田赋附加税,特别是1931年裁撤厘金后,附加摊派更趋迅速。1929—1934年青岛市田赋收入决算表显示(见图5),南京国民政府征收的田赋一年比一年高,由1929年的441448.83元涨至1934年的660728.57元,四年间涨了219279.74元!张家镇一王姓农民描述了其惨况:“向例租田一斗,年纳麦三斗,粮款种子,概归佃户负担,今则欠人租种,免纳租麦,仅望代负粮款,亦绝无人敢应命”^②。可见,青岛市政府虽然施行了减免灾区农民赋税的政策,使部分农民受惠,但逐年增长的田赋增加了整体农民的沉重负担。

(三)国内粮食贸易向好,粮食出口未见好转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限制洋米洋麦输入,促进国产米粮出口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国内外经济形势及粮食市场的变化对国内粮价的冲击;青岛市政府加强市场监管,通过取缔奸商私运及不正当粮食消耗等措施,规范了粮食市场秩序。政府在应对粮价波动危机的过程中,在加强市场监管、推动官商合作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有效的反馈,但在推动粮食出口贸易方面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1925年到1937年青岛花生、花生仁、豆油、棉花等土货的出口情况来看(见表3),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主要土货的出口价值自1932年一落千丈,后来再未恢复起来,且此阶段青岛的出口价值整体低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反映此时期青岛粮食出口贸易相对低迷。以花生为例,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减轻了码头费、出口税等来救济土货,使国内花生米的行情逐渐稳定,价格由每担3元左右涨至6元以上,但是花生的出口价值是一路走低的,由1931年的3602015海关两降至了1934年的787170元。

表3		1925—1937年青岛重要土货出口价值表		
年度/土货	花生	花生仁	豆油	棉花
1925	1687073	15786391	62876	3216112
1926	1737811	15427183	160212	877501
1927	1491823	14005692	107640	3740871
1928	1487681	6791200	42828	3036818
1929	1046597	12430278	120288	2052757
1930	1537730	20618016	243796	3780664
1931	3602015	23501385		5571485
1932	2016300	14726719		794089
1933	1421716	8030552		701733
1934	787170	6333150		393164
1935	1137455	10934910		2080357
1936	837703	5056470		2719019
1937	476237	5891653	1153	5544605

资料来源:交通部烟台港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5—157页。

说明:1925—1931年土货的价值单位为海关两,1933—1937年货物的价值单位为国币。1海关两≈1.558元国币。空白处表示未做统计。

① 青岛市志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粮食志》,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②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1页。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由于特殊的商业地位和殖民历史,青岛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消费、集散市场,凭借成熟的粮食流通网络与国内外粮食市场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青岛区域粮食产需缺口日益增大,加之世界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粮食倾销,青岛出现较大幅度粮价波动现象,制约青岛粮食贸易及农村经济发展。平稳粮价和扶持农村经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当务之急,基于青岛农业落后的市情,青岛市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推动农业改良,促进农村金融流通,大大推动了青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在粮食增产方面收效甚微,未能有效弥补区域粮食产需缺口;基于青岛粮食集散、消费市场的定位,青岛市政府在粮价调控过程中,促进国内粮食市场流通,减少帝国主义经济干预,在平抑粮价方面取得一定效果,粮食市场形势一度向好,但粮食对外贸易未见实质性起色。青岛市政府应对粮价波动的一系列调控措施颇具地方特色,其应对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府处理粮食危机及调控物价的能力,也暴露出农业增产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上接第19页)

生之说。道光七年(1827)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编》^①中也收录了《捕蝗考》,但在汇编时对内容进行删减,仅留“蝗灾之时”“蝗生之缘”“昔人治蝗之法”“捕虾子之法”“事后剪除之法”及“陈龙正语”,以突出其经世之用,并改称《捕蝗法》。丛书于学者研究甚为便利,“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②但是其卷帙繁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籍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咸丰七年(1857)蝗灾尤甚,清代郁松年将其从《昭代丛书》中提出,单印发行。又有湖南省宁乡县县令耿维中借鉴《捕蝗考》中食蝗之法,虽食蝗之风南方颇少,但可用作饲料“饲鸭则肥,饲豕则壮,粪田则禾茂异常”^③;浏阳知县的袁青绶在《除蝗备考》中引芳生所述蝗之发生变化及食蝗之法以证其说^④。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官员推行《捕蝗考》中的治蝗之法。1935年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曾赞许彭泽县县长谭适呈报的治蝗经过,及其摘抄《四库全书》中《捕蝗考》中备蝗事宜七条印发各县参考的做法^⑤。

《捕蝗考》版本多,流布广,对后世影响深远。综合比较目前所见《捕蝗考》各个版本的内容,《四库全书》本的内容较其他版本更为准确,所采用的程晋芳家藏本为乾隆年间的版本,接近《捕蝗考》的成书时间。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来新夏主编,〔清〕贺长龄辑:《清代经世文全编·第六册·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学苑出版社,2010年。

② 〔清〕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③ 江苏古籍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84)·民国宁乡县志(1)》,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④ 〔清〕稽有庆修,魏湘纂:《续修慈利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同治八年(1869)刊本影印,第1193—1197页。

⑤ 熊式辉:《据彭泽县长呈送摘抄捕蝗考请印发各县参考等情令仰饰属照》,《江西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233期。